

修订本

資治通鑑

福將軍但之代之騫謂梁曰

皇家讀本

下

张居正

讲评

陈生玺

等译解

非今比也使大

將

爭用

逆說

卓曰王代

乃露

討廣州

刺史陶

義事嬰城固守

遺承書許以兵出

書曰吾至

從

三月復趙王勒立

萬圍徐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修订本

資治通鑑

補將軍但代之騫謂梁曰

皇家讀本 下

张居正

讲评 陈生玺 等译解

非今比也使大

將軍但代之騫謂梁曰

刺史陶嬰嬰城固守甘卓遣丞許以兵出

書曰吾至從三月趙王勒立萬國徐養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治通鉴皇家读本 / (明) 张居正讲评 ; 陈生玺等译解. —修订本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675-3302-8

I. ①资… II. ①张… ②陈…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 ②《资治通鉴》—注释 IV. ① 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4959 号

《资治通鉴》皇家读本 (修订本)

讲 评 张居正
译 解 陈生玺 等
项目编辑 许 静 姚之均
审稿编辑 朱鼎玲
特约编辑 朱笛颖
装帧设计 师 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6 开
印 张 74.5
字 数 12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302-8/G·8105
定 价 98.00 元

出 版 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修订版说明

《资治通鉴》皇家读本（上下两册）初版于1998年3月，出版后即受到读者的欢迎，初印1万册，当年12月又印5000册。2000年3月，台湾汉欣文化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繁字本（上、中、下三册），行销海内外。此书之所以如此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它的内容精当和可读性强。此书本名《通鉴直解》，是明代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主持由翰林院讲官给年轻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当时只有十岁）日讲的《通鉴节要》讲章。原文是选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一段文字，然后用明代通俗的白话文予以分析和讲解，名曰《通鉴直解》。我们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对《通鉴》原文和“直解”进行了新式标校后，对书中涉及到的人和事加以注释，将《通鉴》原文译成白话文，然后加以评议，作为我们对该书的认识和理解。出版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作者商定，冠以《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2005年该出版社为了扩展销路，认为初版本分量较大，建议将初版本的译文删掉，注释和评议亦删繁就简，由原来的120万字缩减为80万字，价格也相应降低了。2006年3月出版，至2011年4月已重印9次。由于此书的广泛流行，部分作者反映仍然希望读到初版本，因《通鉴》原文是文言文，有白话译文，便于读懂，通过详尽的注释，便于了解所述史事的原委。由此我决定对初版本进行一次修订，对初版译文、注释、评议不妥当或有错误的地方予以改正。该书用力最多的地方是译文、注释和评议，尤其是评议的部分是用了很大的功夫写出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对该书的创意。所以这次修订除了对注释中比较烦

碎的部分进行删正而外，对于评议部分过于简略或初版删削不当者，都进行了补正，由于《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直解》所录一些重要史实，尽量查找原始文献，在译文前标明年代，《直解》个别地方错误的，也予以校正。以便读者对该段所述历史事实有一个准确的理解，起导读作用。

其次，该书本名《通鉴直解》，标明张居正撰。事实上该书是由翰林院的讲官分头撰写并进讲的。每次讲完后，将讲章誊写清楚，进呈皇帝，让他在宫内阅读温习，每到年底将本年讲章集中起来，由张居正审阅删定，装潢成册，送皇上阅读，最后由内府刊刻成书，分送各讲官并有关大臣。当时的日讲是每旬三、六、九日常规性的学习，先经后史，先讲解经书，后讲解史书，经书是先《尚书》，次《四书》，《四书》是依朱熹《四书集注》，先《大学》、《中庸》，后《论语》、《孟子》。史书是先讲《通鉴节要》，后讲《贞观政要》。据《万历起居注》记载，万历元年（1573）十二月，讲章编成《大学》一本、《虞书》（即《尚书》中的《虞夏书》）一本、《通鉴》四本，装潢进呈。至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论语》由《先进》讲至《颜渊》，《尚书》由《旅獒》讲至《无逸》，《通鉴》由唐中宗讲至代宗。万历九年（1581）十二月，《论语》已经讲完，次年春即讲《孟子》。《通鉴》已讲至宋徽宗。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政局变化，朱翊钧已经长大成人，日肆淫乐，对于日讲学习，已不像以前那么认真了。到万历十五年（1587）除了例行的经筵（每月二、十二、二十二日，选择经书重要章节会讲）而外，日讲学习正式停止。由此可见《通鉴直解》是由当时进行日讲的诸讲官进讲的讲章，最后由内府刊刻成书的。当时的讲官常设是六人，如万历二年的日讲官陶大临、马自强、申时行、丁士美、陈经邦、沈鲤。三年为马自强、申时行、陈经邦、何洛文、许国、沈一贯。马自强于万历六年病故。万历十年的讲官为陈思育、陈经邦、沈鲤、朱赓、

王家屏、沈一贯。所以无论是《尚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或《通鉴直解》都是由这些讲官分别撰写，由于张居正是首辅，他负责日讲，最后由他审定，所以这些书（《尚书直解》、《四书直解》、《通鉴直解》）都署名张居正撰。张居正是一个外儒内法的人物，而这些撰写讲章的都是当时正统的醇儒，他们都是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解释的。由于《通鉴》是讲历史，所以在某些地方也渗入了张居正的法家思想。

《通鉴直解》一书基本思想是贯彻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和德治思想，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得民心者得天下。道德教化与法治相辅相成。选材着重叙述中国历史朝代的兴亡，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是什么原因。《直解》往往用很大篇幅叙述了一些昏庸腐朽的暴君，拒谏饰非、排斥忠良、宠信奸佞、视民命如草芥、一意孤行，导致了自己的灭亡。所以《通鉴直解》一书可是说是《资治通鉴》的简要通俗读本。而且还增加了战国以前三皇五帝至夏商周，五代以后的宋和元。因为《资治通鉴》卷帙浩繁，没有一定的史学修养是不好读的，而本书经过我们的整理注释，凡是具有中等以上或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员，都可以读懂，尤其对于喜好历史或从政人员，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过去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对《资治通鉴》一书的误解，认为《资治通鉴》就是帮助帝王将相如何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事实上《资治通鉴》一书，是对中国古代历史从战国到五代末几十个朝代和国家兴亡的历史，按照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观念，服从公理和道义而不屈从君主权力，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善恶并陈。尤其对那些残害人民的暴君暴政、昏庸腐朽的庸君昏君、出卖民族利益的权奸，各种罪恶事实都进行了详实的记述，并不因为他们曾是权力至上的统治者而掩盖和隐讳，相反是进行

了批评和斥责，所以《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记载详实的史书，而且还具有一定弘扬正义的批判精神，如若不信，请花一点时间，认真读一读，即可了解。所以我们希望此书能得到读者的欢迎，解释或有不当之处，更请时贤和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陈生玺

2012年8月

前 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国家，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如此。远在周代，就有“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的规定^①。宋朝的大教育家朱熹也说“人生八岁，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及十有五年…皆入大学”。^②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王公贵族，或者庶民百姓，年至八岁，虽然各人条件不同，但按理都应该入学学习。对一般人来说，“学而优则仕”，可以做官。对于王公贵胄来说，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历代帝王对自己子弟的教育，都抓得很紧，专设有保傅之官负责。所谓“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③太子对傅保官要执弟子之礼。唐代，设有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执掌太子的教育事宜。由于教育太子的重要，三师、三少乃是当时品级最高的官阶。宋代建有资善堂，专为皇太子、皇子肄业之所，规定每年春二月至五月端午，秋八月至冬至，为固定讲读时间，所授之书有《论语》、《孟子》、《孝经》、《尚书》、《易经》、《诗经》、《礼记》、《春秋》、《贞观政要》、《唐鉴》、《陆贽奏议》等。明代设有詹事府，负责太子的生活和学习，由春坊大学士与翰林官轮流进讲经史，有《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万历皇帝朱翊钧六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到八岁时，隆庆四年（1570），身为太子太傅的

① 《大戴礼记·保傅传》。

② 《大学章句序》。

③ 《大戴礼记·保傅传》。

大学士张居正就上书明穆宗朱载垕，请求皇太子出阁讲学，明穆宗御批说“年十岁来奏”。所以到了隆庆六年三月，朱翊钧十岁才正式出阁讲学。在封建帝王时代，太子出阁讲学是一件大事，有着隆重的仪式，据《大明会典》（卷52，礼部10）东宫出阁讲学每日讲读仪：

“每日早朝退后，皇太子出阁升座，内侍以书案进，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惟侍班、侍读、讲官入，行叩头礼，毕，分班东西向立。内侍展书，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复原班。次读经书或读史书，则西班侍读官向前伴读亦如之。务要字音正当，句读分明。读毕各官退。每日巳时，侍读、侍讲及侍书官，俟皇太子升座毕，入，东西向立。侍班内侍展书，先讲早所读四书，则东班侍讲官进讲一遍，退复原班，次讲早所读经史书，则西班侍讲官进讲亦然。务要直言解说，明白易晓，讲毕内侍收书讫。侍书官向前侍习写字，务要开说笔法，点、画、端、楷，写毕各官叩头而回。午膳后（时已回宫）从容游息，或习骑射。每日晚，读本日所授书各数遍，至熟而止。

凡读书，三日后一温，须背诵成熟。遇温书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凡写字春夏秋冬月每日写一百字，冬月每日写五十字。凡遇朔望节假及大风雪，隆寒盛暑，暂停讲读写字。”

这就是皇太子读书安排的全部过程，除了仪式烦琐，有展书官、有伴读的侍读、讲课的老师侍讲有两人（一人讲经，一人讲史）而外，学习的程序，和普通人差不多，先熟读课文，然后讲解，讲解后习字，课余时间要熟读，还要背诵。由此可见，一些帝王尽管自己耽于酒色，胡作非为，但他也和常人一样，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所以很重视教育，要选择一班品学兼优的人担任讲官。

据目前所知，朱翊钧开始就学时，读的是《三字经》，然后是《四书》中的《大学》和《尚书》中的《虞书》。当时负责太子学习为首的是大

学士张居正，其次是东宫的辅导官高仪、张四维、余有丁、陈栋、陶大临、陈经邦、何洛文、沈鲤等十余人，都是内阁和翰林院的主要成员。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读《三字经》是比较容易的，而读《大学》和《虞书》，要听懂讲官的讲解，明了它的大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朱翊钧从小就很聪慧，据万历元年朝鲜来华祝贺万历帝登基的使者在北京所闻：“皇上年方十岁，圣资英睿，自四岁已能读书，以方在谅阴，未安于逐日视事，故礼部奏惟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仍诣文华殿御经筵，《四书》及《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读毕，自近日始讲《左传》。”^①由此可见，朱翊钧在正式出阁讲学之前，在内宫已经开始读书认字，也有了相当的基础。由此亦可见当时的皇家教育还是相当严格的，课程负担也不轻松。

朱翊钧出阁就学刚三个月，隆庆六年（1572）五月廿六日，他的父亲穆宗朱载堉就死了。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朱翊钧于六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万历。张居正乘新皇帝年幼无力独立处理朝政之机，联络宦官冯保驱逐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表示自己不负穆宗的重托，想把朱翊钧培养成自己理想中的皇帝，穆宗还没有安葬，就上书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于八月十三日便开始为小皇帝进行“日讲”。规定每旬逢三、六、九日视朝，一、二、四、五、七、八、十日到文华殿讲读。早晨先读《大学》、《尚书》十遍后，由讲官进讲，讲毕休息，近午时又进讲《通鉴》节要，讲读后习字。根据万历元年十二月张居正的《进讲章疏》称：“臣等谨将今岁所进讲章重复校阅，或有训解未莹者，增改数语，支蔓不切者，即行删除，编成《大学》一本，《虞书》一本，《通鉴》四本，装潢进呈，伏望皇上万机有暇，时加温习。”

《通鉴直解》一书，就是隆庆六年下半年开始日讲至万历元年十二月期间给小皇帝讲解《通鉴》和进呈阅读的讲稿，此后十余年接续不断。

① 《李朝实录·仁祖六年》。

到万历十七年已讲到宋徽宗，第二十六卷。此书明末最初在坊间发现为二十五卷本，以后又发现全本二十八卷，内容接续至南宋和元。另外《大学》、《虞书》逐步增补成《四书直解》和《书经直解》两书。在此期间，隆庆六年十二月还曾进呈了《帝鉴图说》一书。这几部书都是由当时的讲官分头编写，最后由张居正修改删定，进呈给皇帝的，所以它部分地反映了张居正思想和观点。《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所编，司马光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的宋英宗进讲之用，每编完一段，即进呈一段，给皇帝讲读，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魏、赵三家分晋，终止五代末后周显德六年（959）。而《通鉴直解》一书则上起三皇、下至宋元，战国以前采摘自宋代刘恕的《通鉴外纪》，宋元部分则采摘自明薛应旗的《宋元通鉴》。所以《通鉴直解》一书涵盖的时代，远比《通鉴》为长。刘恕曾经参加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负责南北朝和五代部分，他在修《通鉴》之余搜集资料，打算将宋代一祖四宗（从宋太祖到宋英宗）的史事修成《通鉴后纪》，战国以前史事修成《通鉴前纪》，刘恕只修成前纪就病倒了，故而定名《通鉴外纪》，共十卷，起自伏羲，终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通鉴外纪》也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宋元通鉴》乃明嘉靖年间，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薛应旗采辑辽、宋、金、元四史及个人文集、笔记，花了十年时间撰成的，上起宋太祖下至元顺帝，凡482年，157卷，着重于义利与君子小人之辨，所以《通鉴直解》一书事实上是一部以《通鉴》为主，采摘其他史书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当时皇帝读书是先经后史，认为经以载道，史以纪事。经是讲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经的道理要表现在事物上，才能见其长短，所以也要讲史，因为皇帝要亲自治理国家，相比较讲史就更有现实意义。宋代以前多讲《贞观政要》，宋代以后多讲朱熹的《通鉴纲目》。明孝宗朱祐樞（1407—1505）喜读《通鉴纲目》，但患其篇卷繁多，曾命李东

阳等撮《纲目》之要，撰《历代通鉴纂要》（92卷）。《纲目》重视纪纲和正统，《通鉴》重事实，张居正不选《通鉴纲目》而选《通鉴》，说明他对这两部书持有不同的观点和倾向，他比较重视历史事实。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典的史学巨著，网罗宏丰，卷帙浩繁（294卷）。《通鉴直解》一书则选取一些重要片段，加以通俗的讲解，一方面继续发扬中国传统政治的某些固有观念和优良传统，如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德治；崇尚节俭、反对奢侈；主张轻徭薄赋、善于用人等。一方面针对明代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特点，重视历史上的各种改革，总结历史上的兴亡教训。同时，也对某些重大的治国策略和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例如：

一、唐玄宗为什么先治而后乱。

唐玄宗初即位时先用姚崇（元之）、宋璟而治，后期用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对此《直解》说：“玄宗之任姚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需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之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之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卷17）这就是说，同样是用人，委以专责，信任不疑，但用了姚崇、宋璟就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就乱，原因是选择不慎。所以用人，知人和选择是关键。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与宰相崔群讨论唐玄宗何以先治而后乱，“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頌、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对此《直解》说：“夫古之英君，

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由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检，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卷21）正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同一个玄宗，前期而用君子，后期而用小人，其根源在于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在心理上从喜欢君子而变为喜欢小人。

二、唐高祖李渊和唐睿宗李旦的建储问题。

唐睿宗即位后，要立太子。宋王李成器是嫡长子，本应先选，而第三子平王李隆基诛韦后乱政，中兴唐室有大功，究竟立谁好呢，睿宗犹豫不决。在此期间，李成器主动提出让贤，才立了李隆基，成就了后来的“开元之治”。对此《直解》说：“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貽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以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卷17）张居正是主张太平时建储以长，非常时建储以功，谁有功就应立谁为太子，把皇位传给他。李世民有功，继位后成就了“贞观之治”。李隆基有功，继位后成就了“开元之治”。李旦的英明之处，主动把皇位传给了李隆基，也保全了李成器，李渊的错误是不能舍弃长子建成，导致了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建成被杀。这是古代拘泥于立长的重大历史教训。

三、关于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欲用王安石，群臣反对，神宗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帝曰：“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直解》对此解释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

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遂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卷26）认为一种制度，时间长了，自然会产生许多弊病，必须改革。神宗时，宋代的国势，也急需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变风俗。立法度”都是对的，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王安石操之过急，没有从当时的人情风土出发，逐步实施，使天下得到变法的好处后再逐步推广，而是急于求成，想一蹴而就，又不能容纳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性格过于偏执，导致了任用非人，使朝政日益混乱。张居正以一个政治家的经验来评论王安石，有他独到的认识和体会，是比较公允的。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也由于他能借鉴于这种历史经验。

四、崇尚法治。

张居正是明末的改革家，很崇尚法治。他针对明朝后期制度废弛、纪纲不振的情况，主张以法治国，治国从严。

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崔实撰《政论》一文曾说：“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认为汉宣帝治国以严，取得的效果，比汉文帝还要好。汉元帝多行宽政，是汉朝衰败的原因。对此《直解》解释说：“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

不免，故严刑峻法，警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卷12）在此张居正把自己在隆庆二年（1568）提出的改革主张“综核名实，责任考成”也加在了崔实的头上。可见他是主张以严治国的。

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随刘备入蜀，法制较严，法正曾提出反对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回答说：“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而著矣。”（卷12）对此《直解》解释说：“诸葛孔明此言，诚为识事务知政体者，然所以行之，则有本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既有此平明之心，故其用法虽严，乃能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贤愚殒亡其身，而人心无不服也，真可为万世相天下者之法矣。”他认为治国就要像诸葛亮以法治蜀那样，法虽然很严，但执法很明，故人人畏服而无怨言。

五、严华夷之辨。

明代有严重的边患，北有蒙古，东北有女真，南有倭寇，所以他继承中国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思想，主张严华夷之辨。晋惠帝时江统撰《徙戎论》，他说：“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贄，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也。”“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卷13）对此《直解》说：“其后仅一再传，而胡酋刘渊果以五部倡乱，羯则石勒、氏则苻洪，羌则姚弋仲，鲜卑则慕容廆，迭起乱华。终晋之世，海内纷扰，以至于亡。”至

于西晋之亡，是八王之乱开其端，而少数民族“五胡”乘其虚。所以张居正认为对待边疆的少数民族或境外夷人，以防御为主，不使来犯，戎夷跑了也不要派兵远征。应该把居住在关中地区的夷人迁至塞外本土。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太宗消灭突厥，威声远播，于是四夷酋长都来朝于阙下，请上太宗为天可汗。对此《直解》说：“这虽是太宗抚御夷狄权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虏酋之号，则陋莫甚矣。是以终唐之世，其治杂夷，至于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内乱，遣宗女以嫁番虏，驯至五代，而中原之地，悉为戎马之场，然皆天子好大喜功之一念启之。故先王之制，内华外夷，正名辨类，不以夷狄乱我中国，亦不以中国变于夷狄，太宗此举，不足法也。”（卷15）认为唐末之乱，都是由于太宗允许夷狄居中国，并任用夷人为官所致，派宗女和亲也是错误的。他是主张边疆的少数民族与中原的华夏各居其地，互不相扰，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严防其入侵，即使他们俯首称臣，可以进行贸易，但绝不许入居内地。隆庆年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的“封贡”议和，张居正也是促其实现者之一。

从以上各端，可以看出《通鉴直解》一书的概况与特点。尽管万历皇帝当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但张居正利用这一教育机会，灌输自己的政治思想，以期在执政中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喜的是，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1573-1582）张居正执政时期进行了若干改革，没有遇到来自万历皇帝方面的掣肘。但可悲的是，由于他矫枉过正的功利主义，政治操守不端，勾结宦官打击陷害自己的同僚和政敌，在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万历便听信了各种告发和谰言，将张削官夺爵，满门查抄。但张居正执政时期，曾造成晚明一度的国家繁荣，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可见，《通鉴直解》一书，有它特殊的文献价值，它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皇家的教育情况，一方面也是万历初年君臣求治局面的产物。

由于万历当时年龄很小,所以《通鉴直解》所选取内容采取了量力的原则,以正面教育为主,对于一些王朝更替所发生的复杂政争,以及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战争均未述及,对于宋朝也多讲北宋而少讲南宋,对元代更为简略,它可说是改编《通鉴》的一部代表作。现在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有助于普及历史知识。为了便于读者对本书内容和特点能一目了然,我们按其实际内容改定为今名《〈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出版。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陈生玺

一九九七年四月